

東南亞的發展與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鄭赤琰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東南亞的發展與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鄭赤琰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1998

作者簡介

鄭赤琰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香港崇正總會會長、香港創建學會秘書長、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會長。

東南亞的發展與「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作 者：鄭赤琰

出 版：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 地址：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84-86 號
崇正大廈 9 字樓

◆ 電話：(852) 25749882

◆ 傳真：(852) 28347749

版 次：一九九八年五月第一版

印 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國際書號：962-85267-2-3

定 價：港幣 20 元 ◆ 臺幣 8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出 版 物

研究專論

1. 兩岸三地的交流互動：香港民意的趨向
王家英 著
21 x 14 cm，33 頁，1998 年 5 月出版
定價：港幣 20 元或臺幣 80 元

以上書籍，歡迎向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直接郵購，請將購書名單連同付款支票（抬頭寫「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寄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84-86 號崇正大廈 9 字樓崇正總會收，不另收郵費及包裝費，但如需以掛號寄付，請說明及繳付郵費港幣 10 元。

東南亞的發展與「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鄭赤琰

緒論

到目前為止，儘管在經濟學上對市場已有相當的理論與實踐的認識，在先進國家中，也普遍相信市場的開放與不斷的開發，也相信奉行自由競爭的原則，最終將導致互惠互利的結果，但由於國家主義、地方勢力，以及宗教信仰或是意識形態等等因素的影響，使到市場的開放、發展與自由競爭仍未能充分發揮，甚至仍要受到諸多的阻力。

本文將以市場的角度來研究「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與東南亞發展的互動關係。要全面了解其中的互動關係，必須從市場的發展過程、市場發展所面對的阻力、市場本身的優勢與弱點去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到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對東南亞的發展有甚麼互利的運作關係，從而也可了解到現有流行著對中華經濟協作系統所持有的不正確看法。最明顯的錯誤是持有對這系統的恐懼感，以為這系統的強勢發展將會直接或間接地損害到東南亞的市場利益，這看法的正誤只有從兩地的市場發展的互動經驗可以得到證明。

由於市場的發展及其所面對的阻力主要來自政治及其相關的因素，如意識形態、種族、宗教、地方勢力等等，因此本文將從政治的層面去對課題進行研究。事實上，從古到今，不分地區，任何的市場發展與運作除了市場本身受到資源的局限外，最大的阻力是來自政治勢力（political force）但是政治的運作雖然有其種種考慮而對市場發展加以阻礙或調節，但同樣也基於市場發展的原因，促使了相對因佔有市場優勢而崛起的政治勢力進行反擊。表面看來，似乎是政治勢力在操縱市場，但從人類發展的長遠經驗可見，事實上市場始終是政治的動力，政治本身不會有動力，如果一個政權不具備市場運作的任何能力的話，由歷史發展的經驗已得到充分的證明（儘管仍有很多人看不到或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個政權愈是具備市場運作的能力，便會愈強，相反也是如此。儘管有些政權靠槍桿子崛起，如果其忽視市場運作能力的相對加強，這個政權不可能生存下去，更遑論繼續強大，這點在中國有長期的經驗印證。漢朝對這問題有很好的經驗總結，目擊漢武帝錯誤地以武為國家基本，好大喜功，連年東征西討，國庫空虛，民不聊生，政權基礎受到嚴重動搖，代表有識之士的「文學」對此作出批評，指出政府「與民爭利」，控制自由市場，把國家資源包攬在政府手中，政府富，人民窮，政府有資源拿去打仗，人民窮到沒有財富去繁榮市場，因此建議「小政府，大社會」，國家不要與民爭利，應藏富於民。¹英國的經驗也如此，百年戰爭把封國諸侯割地自重的基礎打跨，才能興起工業革命的自由市場經濟運作，阿當·史密斯總結這經驗並提出了他的「供求律」的市場理論，成了當今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根據，他指出供給與需求這個市場槓桿規律愈是讓其自由運作，市場便愈有活力，愈會得到發展，社會也因此繁榮，國家也因此而強大。

英國之所以以一個彈丸小島，能夠擁有全球極大版圖的殖民地，正是因為懂得將市場擺脫政治控管的道理，其發展殖民地也是採用市場為目的，政治軍事為手段的一套基本殖民地政策。美國是英國殖民地，也繼承英國的一套辦法，即自由主義（liberalism），Chandler 也因此得到更直接的結論：是市場鑄造社會，不是社會鑄造市場。²

基於上述的基本觀點，本文作者經過長期觀察所得的結論，強烈顯示出：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與東南亞發展在這個市場強大力量的鑄造下，事實上在不停地作出互動的關係，而且不但是互利的關係，還有一體化的趨向。這個現象，尤其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更舉世感受到，為了減少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決定不作出相應的人民幣匯率調低，台灣更作出表態以投資方式去對東南亞作出救市活動，香港也決定不取消港元與美元聯繫匯率的原有做法，好讓東南亞藉其幣值低落的優勢，刺激其外貿增長，提前步出經濟困境。儘管中港以行政與政策去干預兩地貨幣匯率的市場走勢，有違市場規律，但就市場共感的情況來看，其一體的連鎖反應，已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充分被感受到。這種互利與一體的發展過程正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工作。

兩地共通系統的發展過程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與東南亞發展之所以成為系統上的共通性，是經過（第一）殖民地的影響；（第二）獨立建國的影響；（第三）區域發展的階段。三個階段都有其連貫性與持續性，基本上都由市場的力量去促成其共通性與互利性。儘管兩地在政治上有不少互相抗拒、互相猜忌的力量，在阻止或緩慢這一體化的發展，但由於市場發展的力量基本上並

非任何一個政治力量可以阻擋得到，所以從長期的發展來看，通過市場的運作，一體化的勢頭是銳不可擋的。以上三個階段的發展正好說明了這點。

殖民地的影響

談到殖民地的影響可以說是非常深遠的，在西方殖民地主義者來到遠東前，雖然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經濟聯繫在宋明兩代已略有記載，在明代鄭和下西洋期間，中國南方沿海與東南亞以及阿拉伯的通商已相當暢旺，尤其是福建的泉州更成為當時的國際商港，可是清朝當政初期因為提防流亡海外的「反清復明」反擊，實行嚴厲的海禁，終於將宋明兩代建立起來的經貿聯繫完全封殺，直到清末西方勢力東漸，打開中國的門戶後，才重建起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聯繫，但這過程也經歷了相當的掙扎，主要是清廷對於西方的商貿已有抗拒的態度，初是嚴禁外商入境自由做買賣，只在沿海一些商站交易，洋人受到諸多限制的同時，也發現東南亞的豐富資源，於是歐洲各地的商業勢力也就趁機在東南亞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在企圖打開中國的門戶之前，他們在此建立了各自的政經據點，主要目的還是以此作為橋頭堡，隨時伺機向中國出發，在他們的心目中，充滿了馬可孛羅式的「黃金夢」，再加上除了香料外，類似馬六甲的王朝城市幾乎不見，見慣了歐洲新興富貴城市的洋商仍見不到東南亞天然資源的財富所在，只迷求於中國的白銀與文明，直到鴉片戰爭過後，中國門戶被洞開，中國海禁不再，加上東南亞殖民地政權也開始穩固下來，開發當地天然資源成為一時風氣，首由英國在馬來半島、緬甸、北婆羅洲、葡萄牙與荷蘭在現在的印尼、法國在印支三邦、西班牙在菲律賓都紛紛加緊他們的農業與礦業的開發。這時中國的門戶開放，加上中國對外

戰爭引起國內的動亂，觸發了大批海外移民潮，正好提供了歐洲殖民主義者大批廉價勞工被他們僱用來開發殖民地的資源。從十九世紀末的二十多年到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內不到半個世紀，東南亞的華裔移民潮頓時形成了他們的社區，在歐洲殖民地政權的策劃下，新的城鎮紛紛建立，所有現在的東南亞各國的大小城鎮都是在此期間冒出來的，如英國殖民地馬來亞的檳城、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新山及北婆羅洲的左晉、砂朥越、荷蘭的殖民地印尼的耶加達、泗水、棉蘭、英國殖民地緬甸的仰光、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的馬尼拉、法國殖民地越南的河內、西貢、柬埔寨的金邊等等，如果再看次一級的小城鎮，更是與大城市聯成一個市場網絡，使到這些殖民地的開發變成活躍起來，在研究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崛起過程中，有不少學者發現，其中一個重大成功因素是新興城市的建立，其中維柏更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這些城市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研究美國的崛起過程中，也有不少學者歸因於其成功城市化的結果，東南亞殖民地化的過程也有類似的現象，因為城市化的建立，同時也奠定了現代化的自由市場在此城市與市鎮據點中冒出頭來。

在我們研究東南亞發展與中華經濟系統的關係時，必須充分留意這些城市所扮演的紐帶角色，因為這些城市的發展不但成功地推動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把中華經濟系統與東南亞發展搭上了關係，這個現象從這些城市的發展起步，到其逐步成長、壯大，以至今天的宏偉規模，不但不會減弱其關係，而且只有愈來愈加強，因為這個關係是由市場的運作為基礎，除非把這些城市拆除，否則自由市場經濟便會根深蒂固，不斷滋長，在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曾數度得到證明，當某個政治勢力起來，因他們特殊的政治目的，企圖想打倒兩方殖民地政權或是想根除資本主義的勢力，但是都

不成功，因為他們在進行政治鬥爭的過程中，有計劃或無意間，把這些城市與市鎮的運作完全癱瘓，市場運作嚴重受到破壞，已習慣了這個市場經濟的民生也立刻陷入絕境，使到整個反資反西方殖民地的政治運動帶進絕路。

這個經驗在日本侵略東南亞的經驗中出現過，當時日本在軍事上把所有西方殖民地軍隊打敗後，在這些城市進行嚴重的追殺抗日人士，尤其是針對所有參與捐獻抗日費用的華人，使到所有的東南亞城市與市鎮全部陷於死城，作為整個東南亞經貿、運輸、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不少過五分之一的華人被殺害，整個城市人口中，華人不少過七成，華人避難而去，使到整個城市變成死港，日本佔領東南亞三年八個月，新加坡完全癱瘓，其他所有城市也都如此，印尼、菲律賓、馬來亞受影響到完全停頓的極限。結果日本佔領了東南亞，不但得不到其豐富的資源，反而因長期陷入了戒備狀態而受害，最後以慘敗收場。

另一個慘敗的經驗是由赤柬體驗出來，在打倒親美的朗諾政權後，以波爾布特為首的赤柬政權為了想根除資本主義的反撲，進行很徹底的城市人口遷移計劃，單是首都金邊的二百五十萬人口，在不到二週時間，被赤柬軍人用槍尖恐嚇下，全部「上山下鄉」，其他大小城鎮無一倖免，因種種反抗或因無法擺脫長期習慣下來的市場經濟生活而被受害的人，舉國無一倖免，赤柬的名聲不下於日軍的殘暴。

再另一個經驗是由印尼體驗出來，在過去的蘇卡諾政權或是現在的蘇哈圖政權，都曾發生過在城市或市鎮遊行排華的政治運動，口號是反對華人操縱他們的經濟權益，真正的政治目的卻是想通過排華行動來擊垮影響民生極徹底的市場經濟，為了繼續民生，政府必然全國派出軍隊對暴亂份子進行鎮壓，由於這些城鎮與大城市分佈在數千公里以上的千計

大小海島，反對勢力極清楚政府軍無法有效恢復社會秩序，事實也證明蘇卡諾的政權根基因此被排華運動所動搖。蘇哈圖目前也同樣陷入這種危險，印尼這經驗也印證了這些城市與市鎮對整個經濟正常運作的關鍵性。

再另一個極重要的經驗是由越南體驗出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共產政府曾兩度進行排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革命，第一次是在 1954 年擊敗法國而取得北越的政權，第二次是在 1975 年擊敗南越政權而統一了全國。第一次革命時所進行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嚴重地打擊到原有城鎮的自由市場的經濟系統，引發了大批城市居民逃向南越。第二次在南越進行共產革命時，自 1975 年南越親美政權倒台後開始，也在南越進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清除工作，引發了舉世震驚的越南難民潮，單是逃往美國的難民超過百萬，香港持續二十年不斷為手上不少過五萬以上的越南難民遷走的問題掙扎。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華裔難民佔難民總數的八成以上，這些難民都是因為長期適應了原有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忽然而來的強迫性反自由市場經濟完全不能適應，因此冒著生命危險，坐著破爛的小船逃離南越，結果南越的城鎮也因為這個反自由市場經濟的革命而陷於蕭條，最後被迫於民生問題與經濟一蹶不振，而不得不再度開放這些城市，重新歡迎外商投資與營商，重振這些城市的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主力，仍然是重返越南的前廠商與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的華裔工商界。

上述的經驗顯示，自西方殖民主義者到來後所建立起來的城市與市鎮，已把源自歐洲近代的自由市場經濟牢固地植根於東南亞，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不屬於歐洲獨有，上述的漢代《鹽鐵論》已說明了這點，但最後成功地在歐洲壯大起來後，許多反西方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在推行國家

主義獨立運動的過程中，錯誤地把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系統貼上殖民主義的標籤，在反帝反殖的過程中，將洋人努力建立起來的自由市場經濟系統一道打擊，以為這樣做的效果便會取得他們期望的經濟自主權，從而可以建立他們的經濟繁榮，但是自近代自由市場經濟破除了各種障礙而在全球植根，並發展其強國的市場網絡，奠定了一套以市場去豐盛民生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成為現代生活與現代化的強大政經實力標誌，上述的各種政治企圖之所以失敗，原因不在於他們是否能把洋人逐出去，而是他們沒法想出一套比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系統更能繁榮安定民生的經政系統，因此在破壞了這套自由市場經濟系統後，出現了政經運作的真空與混亂，因而導致了這些政治企圖的失敗。

討論過了這些城市與市鎮和其穩固成長的自由市場經濟系統在東南亞興起後，殖民主義者還同時在中國沿海、台灣、香港與澳門促成了類似的城市與市鎮的冒起，這些新興的城市與市鎮同時也滋生了自由市場經濟，與東南亞的城市與市鎮一樣，這些城鎮也都以溝通國內外經貿、促進民生的消費市場為生。傳統上中國的經濟以鄉村與城鎮自供自給為主，與東南亞傳統很相似，因此在傳統上兩地根本可說見不到有甚麼密切的經貿聯繫，通過西方勢力的推動，兩地新興的城市與市鎮也就在同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下，不斷地緊密聯繫。這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人的經貿熱點上海、寧波、廈門、香港、廣州、澳門、台灣、新加坡、加爾各答這些著名的遠東大城市成為東西經貿網絡的市場動力可見到。通過這些大城市，不但彼此有相當的經貿聯繫，同時也都打開了東西經貿的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傳統上兩地的生活以農業自耕自足為根本，價值觀則以節儉為訓，物質生活簡樸。經歷了這種自由市場

經濟的改革後，農業慢慢變質，大型的橡膠、煙草、丁香、甘蔗、胡椒園坵農業在東南亞興起。中國的沿海農業也同樣起了變化，出口導向的農業逐漸侵蝕了傳統以糧為自足的農業，兩廣的茶葉、蘇浙的養蠶農業成為外貿的熱門貨。這種經濟轉型所引起的重大影響，可以從後來中國連串引發的思想辯論，與毛澤東領導的翻天覆地的反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可見一斑。

值得在此指出，從統計上來看，儘管東南亞各大城市之間，或是中國各大城市、香港、台灣與東南亞大城市之間的雙邊貿易，看來並非這些大城市的主要貿易伙伴，西方才是他們的貿易伙伴，但是此時期的重大經濟連鎖關係，不單是因為城市與市鎮興起，使兩地同步走向自由市場經濟系統，同時也因此把兩地與西方的經濟體系搭上了網絡，更重要的是，兩地經濟關係是通過殖民地者在開發東南亞市場時，大量地引進了華裔勞工，這批經濟移民在數量上看來，對某些地方並不足以對人口的比例作出重大的改變，但對某些地方來說確也明顯改變了人口的比例，馬來半島便是一個例子，如果把新加坡人口計算在內，華裔人口的總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竟然超越原住民的馬來人，其他東南亞各殖民地的華裔人口也只佔全人口的 5% 左右。從人口統計數字看來，沒甚麼重大意義，但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意義可大。

首先，這批華人肩負著殖民地的經濟開發重任，英國在馬來西亞移進華裔開發橡膠種植、胡椒種植、錫礦、金礦開採、木材開採、運輸工作，荷蘭移進華裔到印尼，也同樣賦予開發農礦業，菲律賓的華裔、緬甸的華裔、印支的華裔也都大同小異，甚至連不屬於殖民地的泰國，也都因為東南亞現代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引來了足夠改變其經濟結構的華裔，因為本地人在這些新的經濟運作場上很少參與，華人成

了這種新經濟體系的主要角色，同樣，在中國各大城市，香港、台灣的中國人也都參與了這些新經濟運作，通過這些新經濟體系的市場運作，兩地的華人也就構成了商業網絡，這種網絡隨著經濟發展之趨向多元化、區域化、全球化，便愈會往縱深發展與加強殖民地，初期看來似乎兩地的勞工沒有多大關聯，但由勞工推動出來的種種市場發展，商業網絡的編織便牢不可破了。如果從今天兩地的工業與金融業的互動關係來看，情況當更清楚。

其次，由於這批華裔勞工成為早期新興自由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再加上他們多被集中在大型種植園、礦場、木場與運輸港口，因此由這批勞工所產生的商業多元化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他們因此促成了城市與市鎮的成長，由於東南亞殖民地不成為西方洋人的移民目標，他們的目標是南北美洲、澳洲以及非洲一些地方，來東南亞的洋人多以商人、官僚、軍人以及傳教士，他們是以短期工作性質，不會定居，為了不想在政治與經濟上對原住民遷動太大，怕因此更容易失控，因此他們必須從中國與印度搬來大批勞工，華人儼然成了各地新興城市與市鎮的主要市場運作角色，³ 當這些城市與市鎮隨著經貿的發展而變成了現代化的中心時，正如任何區域走向現代化的經驗一樣，區域內的城市也會作出多方面的聯繫，這些聯繫有商貿的、有政治的、有社會的、有交通的、更有文化的，因為東南亞城鎮的主要運作者是華人，這種聯繫更密切，近來學者興用「網絡」的理論來看待這種聯繫，但是這種「網絡」的形成因素不能視作純由「華人」的文化、社會、族群、語文教育而有華人網絡的結果，較被人忽視的「網絡」因素，最大的是自由市場的共性，其次是政治因素的催化，舉個實例來看，市場的共性把新加坡、檳城、吉隆坡、馬六甲、棉蘭、巨港、耶加達、曼谷、

合艾、怡保等城市結成了「商業網絡」，因為初期殖民地經濟結構是以橡膠、椰子、丁香、糖、茶葉、錫礦等土產出口為主，這些土產因為碼頭港口運輸服務，因為金融信貸服務，因為市場資訊服務，使到新加坡成為印尼、馬來半島，以及泰國城市的市場「網絡」中心。由此可見，新加坡之成為華人的經貿中心，絕對是市場的共性多過華人的共性。談到政治因素這個催化劑，實證的例子也不斷浮現，過去殖民地時代如此，現在也如此，殖民地政府曾實行一套「契約勞工」政策，在此政策下，早期華裔勞工以男丁為主而且有居留期限，沒有長期定居的移民權利，因此使到這批華裔勞工的流動性大或是相當長期無法安定下來，尤其是與他們的原居地家鄉的聯繫更斷不了，加上當地的排華政治運動，如十九世紀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反殖民地獨立運動期間所觸發的排華政治暴動，使他們對當地的政治認同有了困難，與他們的家鄉也沒法擺脫聯繫，這種聯繫有多種運作方式，有家族的，如回鄉成親，把小孩老人留在家鄉，以策安全，有經濟的，如匯款回鄉買田地、置業以留後退之路，有政治的，如抗日運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這個運動必須把東南亞華人的聯繫網絡大大加強。

再其次，就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來說，不可能沒有智識的動力去帶動，由於殖民地政策早期不重視發展華人的智識教育，除了一些大城鎮建立了一些以殖民地宗主國語言為教學媒介的學校外，但也都提供有限的學額，較小的鄉鎮更被忽視，因此教育問題也就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空間讓華人社會去開展，碰上中國受到外強侵略戰爭的凌辱，中國現代的問題也趁機掀起了中國的國民教育革命。清朝被推翻後，更因此把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與教學內容全部翻新，這種風氣跟著華人帶到東南亞華人社會，加上民國初年的僑務機關的積

極推動，再加上華人企業發展本身知識化的需求，於是在二十世紀開始的頭二、三十年華文教育在東南亞發展非常迅速，尤其是英國殖民地的馬來半島、新加坡、沙巴的華文中小學的覆蓋面幾乎遍及所有的小市鎮。⁴這一來便大大補助了官方學校的不足，華人新一代的智識化也就被大大提高。經過了以後的獨立建國以及區域化的兩個階段，雖經過波折，但仍然在智識化的下一代更被重視，從而得到不斷的往上發展。今天所見到的企業發展不斷跟隨全球的知識步伐前進，不致感受到技術與管理人員的匱乏，是經過努力爭取的結果。

華文教育在東南亞各地既然得到發展，這不但加強各地華人自由市場的發展，加強華人商業網絡，同時也因此與中華經濟協作系統擺脫不了，在殖民地時代，因為師資的問題，教材課本的來源問題（本地仍沒法提供人材撰寫教材），加上升入大專教育的問題迫使非要依賴中國香港不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出現問題，⁵這種教育的聯繫則繼續由香港與台灣維持，不少學生還到香港求學，更多的學生是到台灣去受大專教育。儘管這種情況在殖民地統治結束出現新興獨立國後曾多次受到阻止，有些國家如緬甸、印尼、菲律賓、泰國等曾因推行國家語文教育而壓制華文教育，在殖民地時期所建立起來的中小學教育也走向式微的道路，但是由於華人採用閩粵各種方言的普通性，加上殖民地時代所推行的英法荷語言一時仍在統治階層的上層社會通用，而華文教育者也多精通多種語文，即使受華文教育的機會已失去，由於市場知識化的需求，他們很快便轉而到西方國家求學，尤其是到英語系的國家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國求學，加上英語也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人的工商界通行。與

此同時，香港、新加坡、台灣也都在英文教育上不斷得到加強，成為東南亞華人受教育的另一出路。總之通過了華人普遍得到雙語教育的好處，東南亞與中華經濟協作地方不但在智識教育方面容易得到互聯網，甚至也與土著經濟容易掛上聯網的關係。

總結殖民地時代的情況，上述討論指出了因為殖民地主義者在東南亞與中國沿海、香港、澳門、台灣這些地方作出了一連串的經貿運作後，通過城市與市鎮的建立，華人參與商貿的運作，華文教育走向智識化並在東南亞興起，加上華人雙語能力的優勢，因此使到近代由兩方興起的自由市場經濟得以在兩地植根。因為這個自由市場經濟的共性，再加上上述三大因素，兩地的經貿關係便因此牢牢相扣。即使到了殖民地統治結束，新興主權獨立國起而代之，中間雖然出現過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抗拒殖民地主義與其經濟勢力而出現過打擊非土著經濟權益，而使到東南亞華人的經貿發展受到限制，在中國大陸方面恰好也在此時期實行到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經濟革命，幾乎完全斷絕與外界的自由經貿活動。但是此期間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仍然通過四條小龍之三條小龍新加坡、台灣與香港的興起而與東南亞的經濟協作繼續得到加強。最後一旦東南亞出現經濟區域化，而中國大陸又出現經濟開放政策，積極鼓勵香港、台灣、澳門與東南亞的華裔到中國去投資做貿易，提供金融與管理技術的服務，兩地的經濟協作關係更進一步得到加強。以下將進一步討論在非殖化出現的獨立建國時期兩地經濟關係的發展情況。

獨立建國的影響

談到獨立建國時期對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與東南亞發展的影響情況，首先必須肯定的，雖然上述的華人經濟權益曾在